

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

熊月之

摘要：香山人在近代上海移民人口中最高时达3万多，绝对数字不大，比例也不算高，但影响却不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出自香山的成功者、著名者如若群星，其中四个方面的影响最大：一是买办集团起步早、势力大；二是环球百货、四大公司，开一代风气，极大提升了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和服务形象；三是小刀会起义；四是外滩公园交涉。前两条学术界论述已多，本文对后两条作了论述。上海香山人身上的四个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这也是香山文化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香山人，香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9-0146-10

作者简介：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寓沪香山人概况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行政格局为一市三治，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相对薄弱，各地移民的同乡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移民的地域特征相当显著，广东人、宁波人、苏北人是最重要的三大群体。广东人中，又以香山人最为突出。

香山，唐代建镇，南宋设县，其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中山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部，珠海、斗门之大部，番禺、顺德、新会之小部。所谓香山人，即指这一区域的人。香山设县之初，因僻处海滨，农田稀缺，粮食不足，经济落后，被列为下县，论经济，论文化，近不能与广州、佛山相比，远不能与苏州、杭州并提，很不起眼。那时的近万户香山人，也没有什么令人艳羡之处。苏东坡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那时整个岭南，都被视为边陲荒僻之地。到明代，香山依旧被视为“其地最狭，其民最贫”^①。康熙朝《香山县志》仍称此地“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于渔农”。嘉庆、道光年间，香山才渐趋富庶，全县人口超过40万，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同列为上县。

香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毗邻澳门、香港，是中国最先飘洒欧风美雨的地方。香山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之时，适逢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香港割让，五口通商，与欧美世界联系空前密切。香山人抓住了这一时机，一面向东南亚、檀香山、北美、澳大利亚移居，一面踩着西洋人的足迹，向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拓展。上海是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香山人

收稿日期：2006-07-23

* 本文的写作得到宋钻友先生大力帮助，提供了许多资料，特此致谢。

① 语出《永乐大典》，参见郑华冠《香山史话》，《中山文史》第15辑，1980年版。

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

最早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香山人，是随洋行从广州北上的香山买办。上海在 1843 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同年上海就有怡和、宝顺等 5 家洋行开设，第二年增加到 11 家，1847 年增加到 24 家，到 1852 年已有 41 家。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洋商觅雇员为事所必然，例所不禁，各听其便。因此，洋行开办之时，也是买办到沪之日。早期洋行买办多为香山人，因此，上海洋行迅速发展，上海香山人也快速增多，宝顺洋行的徐钰亭、琼记洋行的朱雨亭^①、都是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来到上海的香山买办。1845、1846 年先后到上海的怡和洋行的买办阿三、阿福，具体籍贯不详，只知道是广东人，但是，根据那时洋行买办多为同乡人互相推荐担保的惯例推测，这两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为他们的后任林钦、唐廷枢都是香山人。

随着中国外贸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广东商人也纷纷北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日后成为上海道台的香山人吴健彰，原来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同顺行商人，在 1842 年就来到了上海。从事糖业和丝茶业生意的香山人刘丽川，1849 年来到上海，日后成为著名的小刀会首领。

据估计，1853 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 8 万^②，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 2 万多^③。

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日趋增强，香山人来沪日多。到 1949 年底，上海有广东人 119178 人，其中香山人估计为 3.5 万。他们相对集中的区域，为老上海的虹口、新成、静安寺、嵩山等区，在今虹口、黄浦、卢湾、静安等区域内，都是上海的黄金地段。

还在 1853 年以前，广肇帮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焚毁。1872 年，在上海县知县、香山人叶廷眷、大买办徐润等倡导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晚清公所不设总董，只设董事。唐绍仪长期资助公所，因此长期担任董事。从创办到活动，可以看出香山人在广肇公所中占主导地位。公所主要职能，一是建立广肇山庄，定期运送灵柩还里，二是创办义学，为旅沪广肇子弟提供教育机会，到 1919 年，已办 9 所义学，入学人数 1200 人；三是一年一度举办孟兰盆会，将家乡习俗搬到上海；四是设立医院，救治寓沪广肇同乡，五是同乡排解纠纷，提供贷款、信用担保等各种帮助。

香山人在上海的职业门类众多，包括商业、工业、金融、房地产、教育、出版、艺术等，成功者、杰出者、著名者灿若群星，如革命伟人孙中山，政治活动家唐绍仪，对上海政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吴健彰、刘丽川、叶廷眷、吴铁城，著名买办、企业家徐润、唐廷枢、唐廷植、郑观应，上海百货业巨头、创办先施和永安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永安纺织公司的郭棣活，为发展中国糖果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马玉山，为发展中国烟草工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郑伯昭，杰出电影艺术家郑君里，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举世闻名影星阮玲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容闳、黄胜，发明四角号码的著名出版家王云五，这些，都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有许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此外，上海各行各业，还活跃着一批香山人，名气可能没有上面那些人大，但也相当突出，颇有成就。比如，经济方面，为发展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作出重要努力的方举赞^④，香港著名的新

① 一作“朱雨滕”，参见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编委会编《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 页。

② George Lanning & Samuel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 1921. p.299.

③ 据研究上海广东人的专家宋钻友估计，上海香山人通常占上海广东人的 30%。

④ 方举赞(1820-1906)，15 岁到上海，进打铁铺当学徒。满师后在上海各洋商船厂做工，逐步以拆卖外商船厂旧机器、旧船零件积累了一定资本。1866 年，与打铁工孙英德合伙，在英商虹口老船坞对面开办近代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一家工厂发昌号，当时仅是一家锻铁作坊，从洋商船厂包揽一些零件加工业务。1873 年前后，发展为发昌号钢铁机器车房。上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民族机器工业中自行造船的规模最大的机器厂。

都城酒楼总经理、被誉为“酒楼闻人”黄瑞麟是在上海长大、上海起家的^①，发起成立中华实业银行、创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的薛仙舟^②。政治方面，参加领导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革命家杨殷曾在上海刺杀袁世凯干将、镇压上海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刽子手郑汝成，其最后牺牲地是上海^③，实业家兼政治活动家冯少山基本活动地也在上海^④，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而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梁仁达^⑤，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思复一度在上海活动^⑥。文化与社会方面，1949年以前在上海从事教育与革命活动、1949年以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教育家韦恂^⑦，热心女子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徐婉珊^⑧，为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 ① 黄瑞麟(? - 1985)，祖籍中山县，自幼在上海长大。16岁时进酒楼当实习生，后任上海南国酒楼夜总会营业经理。1949年携家迁居香港，将海派风格带入了香港酒楼业，先后开设或经营金宝、香槟、云华等酒楼。1970年出任香港著名的新都酒楼总经理，被誉为“酒楼闻人”、“酒楼业的革新大师”。次年举家迁澳大利亚，先后开设太原、新太原等酒楼，还兼营赛马业。数年成为悉尼商界名流，积极参与华埠内的社区福利事业，曾任澳大利亚华人福利联合会主席、美化德信街委员会主席，具体负责改建、美化悉尼唐人街。1985年在悉尼家中被害身亡。
- ② 薛仙舟(1878-1927)，9岁居上海。1901年赴美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05年留德人柏林大学读研究生。辛亥革命后回国。经南京临时政府派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监督。发起成立中华实业银行，兼任复旦公学教务长。1918年，为上海工商银行赴海外募股。次年归沪，创立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发行《平民周刊》，宣传合作主义。1920年任工商银行总理，并与陈果夫等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1927年9月14日病逝于上海。复旦大学1929年图书馆新舍建成，特定名“仙舟图书馆”以资纪念。
- ③ 杨殷(1892-1929)，1910年在学校宣传反清思想被开除，到广州圣心书院读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在上海刺杀袁世凯干将郑汝成，将郑炸伤。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参军处副官。1919年任广西西关盐务稽查处师爷。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年底赴苏参观学习。1923年初回国，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广州第四区分部委员，兼任秘书。1924年参加领导广东省港大罢工。1925年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六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曾到苏鲁皖等地指导武装斗争。1929年在上海被捕牺牲。
- ④ 冯少山(1884-1967)，幼年随父母侨居美洲，长成后回上海发展实业。1927年当选上海市总商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1928年4月当选上海市总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同年7月26日因反对蒋介石黑暗政治遭通缉，避居海外。1931年9月，虞洽卿等5人联名提请国民党政府取消通缉令，冯回到上海。1940年，傅筱庵被杀后，汪精卫、陈公博让其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坚辞，遂离沪。1945年，与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和民进上海分会理事兼工商委员会主委。解放前任上海开林油漆公司董事长，解放后“开林”与“益民”、“利达”合并由工业部轻工处接管。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第二届赴朝慰问团。1956年起当选上海市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历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民进第三届理事和第四、五届中央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 ⑤ 梁仁达(1916-1947)，19岁入上海永安公司，先当练习生，后升职员，爱打乒乓球，曾获上海第一届华联乒乓赛亚军。1947年2月9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南京路、山东路口劝工大楼召开演讲会，号召“爱用国货，抵制美货”，遭国民党当局镇压，200多名特务混在人群中，肆意殴打出席会议人员，捣毁会场。梁仁达见状怒斥凶手，被暴徒围攻毒打，伤重致死，成为“劝工大楼事件”中著名烈士。
- ⑥ 刘思复(1884-1915)，1912年在广州组织晦鸣学舍。1913年在广州发刊《晦鸣录》，此刊屡次被禁，并于澳门更名为《民声》。1914年该刊转至上海出版。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1月，上海漆业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撰文鼓吹工团主义，要工人“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除贫富阶级”。在传播无政府主义期间，刘思复与传播社会改良主义的江亢虎展开辩论，并将有关文字编成《伏虎集》。
- ⑦ 韦恂(1896-1976)，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广州高等师范、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1928年后任上海市教育局、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等。193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后任上海《译报》总经理和《上海周报》总编辑。1942年参加苏北、皖北抗日民主工作。1949年5月来上海，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教育的改造》、《德国教育思想概论》等。
- ⑧ 徐婉珊(1866-1947)，女，1905年以个人嫁妆费创办启秀工艺女塾，自任校长。校址在爱而近路(今安庆路)。1910年女校增设初中、高中部，扩充校舍，改名私立启秀女子中学，又设小学、幼稚园及义务小学，学生从30余人发展到560人。1937年上海沦陷后，多方筹资，在法租界重建校舍，坚持办学。并在险恶环境中不畏日伪利诱，拒绝汉奸吴世宝担任校董，先后收养十几个贫穷遗孤，抚养成才。

赫赫有名的精武体育会创建人卢炜昌^①、陈公哲^②，著名法国文学家吴达元^③，享有盛誉的建筑学家吴景祥^④，蜚声海内外的魔术大师张慧冲^⑤，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⑥，长期活跃在上海电影界、产品相当丰富有广泛影响的电影艺术家黄绍芬^⑦，以设计“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众多雕塑而出名的建筑设计师谭垣^⑧，擅长风景摄影、出版有《南京影集》、《昆明影集》、《黄山影集》、《西湖倩影》等众多影集的著名摄影家郭锡麟^⑨，优秀儿童文学家郑

- ① 卢炜昌(1883~1943)，上海汉璧礼英文书院毕业。原为礼和洋行职员，后任新瑞祥五金号经理。1911年与陈公哲、姚蟠伯等重建精武体操会，1916年协助筹建精武会新校舍。曾任该会会计、座办、书记等职。1923年为全国武术大会发起人，同年任精武附设体育师范学校校长。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委员。此后，一直主持上海精武体育会工作。1924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兼名誉会计。1936年因参加李济深、李宗仁发动的两广事变，受到牵连，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以“日特嫌疑”名义下狱，1943年死于桂林狱中。著有《少林宗法》、《少林拳术图论》等。
- ② 陈公哲(1890~1961)，是精武体育会创始者之一，15岁参加健身球社，20岁参加精武体操学校，为精武第一批学员，一直是精武的领导核心人员，与卢炜昌、姚蟠伯有“精武三杰”、“精武三公司”之称。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精摄影技术，拍摄了初期精武书籍的照片，并与程子培拍摄了精武体育会的电影记录片5卷。1916年前后，曾两度捐出宅址、家产和房屋给精武会。在精武书刊中发表过数十篇文章。1927年去南京政府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香港。
- ③ 吴达元(1905~1976)，早年在上海广肇义学和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考入南洋大学，翌年转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为该系研究生。1930年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先后入巴黎大学、里昂大学。193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授。1946年冬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法语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并在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兼任教授。著有《法国文学史》、《法语语法》等。与人合著《欧洲文学史》。
- ④ 吴景祥(1905-?)，同济大学教授。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赴法国留学，193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建筑专门学院，获得法国教育部颁发的DESA建筑师学位。回国后任中国海关总署建筑师。建国后历任之江大学教授、华东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1952年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1956年“华沙英雄纪念物”在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得方案收买奖。1981年任上海市第五届建筑学会理事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担任我国沿海港口及内陆江河口岸多项建筑设计。著有《中国的教育与学校建筑》、《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等。
- ⑤ 张慧冲(1896~1962)，祖籍香山，生于上海。1916年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成年后虽从事航海业、电影业，但对魔术一直情有独钟，因发明聂哥拉四面出水而一举成名。上世纪30年代始，融汇中外魔术精华，首创巨型魔术体系，形成独特风格。抗战期间，自组魔术团巡演全国，并3次在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巡回演出，大获成功。1949年后继续从事魔术表演。著有《魔术》上下集。
- ⑥ 杨嘉仁(1912~1966)，祖籍香山，生于南京。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教育系。后赴美国学习音乐理论，获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到上海工作，先后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执教。1949年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 ⑦ 黄绍芬(1911~1997)，中山师范学校毕业后，1925年到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艺徒，初为童星，后学冲印、摄影、照明等技术。1929年与孙瑜合作，拍摄《故都春梦》，后相继参加拍摄《野草闲花》、《一剪梅》、《恋爱与义务》等影片。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赴前线实地拍摄抗日官兵英勇杀敌和群众支援前线的镜头。1933年投入左翼文化运动，参加拍摄《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天作之合》、《春到人间》等影片。1937年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参加拍摄《貂蝉》、《武松与潘金莲》、《白蛇传》等古装影片。1943年，因拒绝与日本技师合拍反动影片《春江遗恨》而离开摄影界。抗日战争胜利后，指导拍摄《夜店》、《假凤虚凰》、《生死恨》、《艳阳天》等。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参加拍摄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大型纪录片。此后担任天马电影制片厂、上海市电影局工程师兼技术办公室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理事、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1953年，参加拍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又陆续拍摄《伟大的起点》、《女篮五号》、《聂耳》、《天罗地网》、《十五贯》、《林则徐》、《霓虹灯下的哨兵》、《枯木逢春》等影片。
- ⑧ 谭垣(1903~1996)，192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之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建国后，任同济大学教授。擅长纪念性建筑设计，讲究设计手法，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教学，提出“轴线分析法”等独特教学方法。1951年设计“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全国方案竞赛一等奖、二等奖；1983年设计“上海聂耳纪念雕塑”，获优秀作品奖；1985年设计陕西“西安英烈馆”，获优秀设计奖。著有《纪念性建筑》等。
- ⑨ 郭锡麟(1896~1976)字澹观，1910年毕业于上海广肇公学。后在上海外商公司、银行任职。1914年开始从事摄影创作。是最早的摄影组织中华摄影学社成员。与胡伯翔、郎静山等研制油渣照片。曾在上海、昆明、南京及杭州等地举办过个人摄影展。1948年任中国摄影学会理事。次年任上海招商局美术室办事员。后从事业余摄影创作。擅长风景摄影。出版有《南京影集》、《昆明影集》、《黄山影集》、《西湖倩影》、《普陀洛迦》等。

马^①，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近代百余年，香山人在上海纵横驰骋，开拓创新，实干巧干，声名卓著，其中有四个方面，对上海经济社会影响最大，一是买办集团，起步早、势力大，在早期上海对外贸易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二是环球百货，开一代风气，极大提升了上海商业中心地位和服务形象；三是小刀会起义；四是外滩公园交涉。前两个方面，学术界研究成果甚多，讨论甚多，兹不赘述，后两个方面，则所论甚少，略述于下。

香山人与小刀会起义

1850 年代，以香山人为领袖，在上海发动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起义的发动、交涉、善后处理，都与香山人有直接关系。

首先，吴健彰重用、偏袒广东人，为起义的酝酿、爆发埋下了伏根。

如前所述，吴健彰、刘丽川都是上海开埠以后来到上海的。吴本为广州行商，以捐纳而为候补道员，早在 1842 年便来到上海。他从官慕久担任上海道台开始，便事实上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办理外交的参谋。官曾以他为助手，参与对外交涉。1848 年青浦事件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很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理想人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吴比较会做生意，但不大会作官，缺乏行政经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上海一部分守军被调往镇江一带驻防，身为道台的吴健彰为安全计，招募粤勇、闽勇，以作防御。上海地方士绅提醒他，这样做非常危险：

古来谭兵者，谓召外兵不如募土著，固也。外兵主客不相习，痛痒无关，生事滋累。土著则家室自谋保聚，子弟必卫父兄。今浙、闽、广各为一帮，本地招募亦非一处，此其势固犹是外兵耳。江、浙懦而多诈，闽、广悍不畏法，近已小有斗狠，诚恐积为厉阶，貽误匪浅。脱巾一呼，变生肘腋，当事者何以待之？^②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地方士绅说的完全在理，但吴健彰听不进去。他做道台，不依靠上海地方士绅，而依靠广东人，特别是香山人。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 40 名广东人为警卫，衙门上下都是广东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香山人。广东帮倚仗这位本乡道台，走私贩毒，偷税漏税，得到好处不少。刘丽川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利用同乡关系，将吴身边的警卫都发展为小刀会会员。后因太平军一时并未攻上海，团练需费浩繁，清政府下令将团练解散，这引起练勇中会党成员的愤恨。小刀会遂酝酿起义。

其次，政府高度机密被小刀会侦知，是起义提前发动的直接动因。

小刀会原定起义时间是 1853 年 9 月 18 日，即农历八月十六。8 月底，隐蔽在吴健彰身边的小刀会成员报告，道署中藏有 40 多万两银子，近期将运走。为了这笔巨款，小刀会决定将起义提前。9 月 3 日（八月初一），吴健彰照例要到天后宫进香，小刀会拟在途中袭击，后因吴加强了防卫而未下手。

① 郑马（1928—1992），1948 年于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南京《大同报》晚刊任记者。194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8 年在《华美晚报》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阿英》。1949 至 1956 年在《新少年报》任记者、编辑，后任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1956 年至 1964 年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上世纪 80 年代始在该社任《少年文艺》主编、副总编辑、编审。有短篇小说集《秘密》，中篇小说《爸爸妈妈离家以后》，童话《有魔法的乒乓球板》、《翘嘴巴的小姑娘》、《小阳伞飞飞》和诗集《“咚咚”响的大队长》、《戴上红领巾的第二天》等，其中诗歌《歌声》获 1992 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② 蒋敦复：《上某兵备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027 页。

再次，起义戏剧般成功，上海道台戏剧般被捉被放，都是广东同乡关系在起作用。9月7日，为农历八月初五，县城内文武官员照例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凌晨，正当牺牲供好、祭者到达、准备祭祀之时，成百上千的起义者头扎红巾，手执器械旗号，冲进县城。县署中担任警卫的40名广东练勇，立即从腰间取出红巾，摇身变成起义者。吴健彰见昔日警卫今日尽扎红巾，始则厉声吆喝，继则容色沮丧，后则北面再拜，作欲自杀状。那些广东小刀会成员念同乡之情，也看在他平日对同乡多有照顾的份上，没有杀他，且以礼相待，劝他加入起义行列。吴不从，结果被挟至西城广东会馆监禁起来。到这时，吴健彰才醒悟，但为时已晚。有人作诗讥刺：

私心自用为乡亲，招集南方无赖人。养虎自伤还误国，资财费尽又殃民。^①

吴健彰被俘以后，如何处置，小刀会内部意见不一。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刘丽川念同乡之谊，下令勿杀。吴是美商旗昌洋行的股东，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吴被俘的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刘接信后，当晚会见马沙利，表示吴的安全没有问题。9月9日，美国洋行派人到吴被关押的地方，让吴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吴出城后，先躲在传教士晏玛太的家里，然后躲入旗昌洋行。他的家属稍后由传教士救出。显而易见，吴表面上是逃走的，实质上是放走的。

小刀会起义及其被镇压，对上海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上海城市重心此后逐渐移往租界，租界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杂处，工部局等机构由此设立。小刀会起义对广东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有一定影响。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请办理善后事宜，凡十四条^②，其中五条与广东人有关，即一、广东游民，未来者严其防范；二、广东游民，已至者分别递回；三、慎选会馆董事；四、稽查洋行雇员情况；五、闽、广商民会馆不准进入城内。经此顿挫，香山人在上海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当时清政府权力并不能达于租界，因此，所谓限制、防范广东人来沪的说法，只是流于一纸空文。此后广东人来上海发展的势头仍然很强。

香山人与外滩公园交涉事件

近代上海，发生过著名的关于外滩公园游览权力交涉事件。这是上海华人与租界当局交涉的大事，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欺凌的著名事件。最初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持续进行交涉的首人物，就是唐廷植等香山人。

外滩公园在1868年建成开放，以后的十多年中，虽然没有公开挂牌禁止华人入内，但工部局授令巡捕，允许衣冠整洁之上等华人入内，禁止下等华人入内。华人可否入园，并无身份证件，全凭巡捕主观判断，因此，不时会有有身份华人入园受阻的事情发生。1885年，公园明示游览规则，禁止华人入内^③。

唐廷植等人的交涉始于1881年。这年4月初，唐廷植等人入园被阻，引起交涉。他们致函工

①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9页。

② 这十四条是：一、广东游民，未来者严其防范；二、广东游民，已至者分别递回；三、慎选会馆董事；四、稽查洋行雇员情况；五、闽、广商民会馆不准进入城内；六、已烧毁的小刀会的活动据点不准再建房屋；七、安抚在战争中受难的百姓；八、逐一清查版图册籍；九、颁发游民出海之禁；十、革除马迹、舢板船；十一、酌添营兵；十二、海防同知酌兼捕盗事宜；十三、已毁学官易地改建；十四、改建衙署。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夜等奏遵旨会议何桂清等所奏酌定上海善后章程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505页。

③ 《公家花园》，《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第二十四项，1903年印刷。载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03页。

部局质问。4月20日，工部局先在覆信中表示，因花园面积有限，势不能尽容华人人内，故禁止下等华人，但衣冠整洁的上等华人可以入园。5天以后，4月25日，工部局推翻前说，不承认华人有享用公园之任何权利。对于工部局前后不一致的表态，唐廷植等很为不满，但也从中看出工部局对于上等华人人园问题是能够松动的。同月4月29日，《申报》提出变通办法，即有限制地向上等华人开放：

或为西人计，不如择华人行栈之家有体面者，每行分与照会数张，准其持此以为游园之执照，如持有执照则听其入内游玩。设有折损花木、作践地方等事，即可令该行赔偿，想各行家深知西例，亦决不使粗卤耀耀之流持照往游。其或有往来过客意欲一扩眼界，即可由该行家处借照以便进园。既可公与人同乐之志，又无虑毁损糟蹋之事；而函中所谓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赏之言，亦有以自实其语，而不致人之疑为权词慰藉。^①

《申报》的建议，得到唐廷植等人的赞成。同年11月，唐廷植、陈咏南、李秋坪、唐廷枢等8人联名具函，“希望工部局能允许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和外地客人能进入工部局管辖之下的娱乐场所”。他们提出有条件开放的建议：

第一、所有善意的真诚的来花园游玩的中国人，必须出示证件。证件由工部局发给。有名望的中外人士的介绍信，或是社区居民团体委员会的介绍信，都可以作为入园的证件。

第二、每星期安排两三天(星期六和星期天)允许持有上述证件或介绍信的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

第三、鉴于现在花园面积小，可以把外滩前面那块用栏杆和链条围起来的草地(译注：即外滩街道绿地)当作花园的附属场地对外开放，供大众休息散步。也就是说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可以使用它，随时随地都能在草地上休息。如果这样做，目前这种不公正的感觉就会消失。^②

此后，工部局部分地采纳了唐廷植等人的建议，由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183张，每证以4人计，全年入园华人有700多人。

这一情况到1890年有所变化，一是入园游览的中国人比以前大为增多，影响了外国人的游览，二是有些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如更改日期，过期的人场券再使用等。游园券的有效期限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他们有意乱用”^③。

此后，工部局对中国游客限制更严。1890年12月，位于苏州河南面的华人公园建成开放，专供中国人使用，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也对游客开放，华人很少再索证游览外滩公园了，但是，身着西装的华人还是可以入园的。

综上所述，唐廷植等人的抗争，取得了局部性胜利。

香山人与外滩公园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抗争的领头人与骨干是香山人。从1881年入园被拒引起交涉，1885年致信工部局要求享受与西人同等待遇，到1889年稟请上海道龚照瑗与租界交涉，查考一下，可以看出，领导抗议运动的主要是如下8人：唐廷植、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廷枢、颜永京与陈辉庭。

① 《书本报工部局复信后》，《申报》1881年4月29日。

② 《唐廷植等八人致工部局秘书函》，《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1885年年报》，译文见《上海园林志》附录。

③ 《上海市公共娱乐场委员会报告——致译泾浜以北租界工部局》，《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1890年年报》，译文见《上海园林志》附录。

8 人当中，除了陈咏南生平无从查考外，其他 7 人情况如下：

唐廷植（1827-1897）、唐廷枢（1832-1892）兄弟二人，为广东香山唐家湾人；谭同兴，广东人，籍贯不详，上海谭同兴营造厂的厂主，后来成为上海著名房地产商；陈辉庭（1850-？），广东新会人，上海轮船招商局翻译^①，1891 年以后担任轮船招商局商董、总董兼会办，1909 年以后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任上海华兴保险公司总理；李秋坪（？-1888），香山人，高易洋行的买办，曾应吴虹玉之请，捐助土地和 10700 银圆给同仁医院建造大洋房、诊治房各一^②。颜永京（1838-1898），祖籍山东，生于上海。1848 年入上海教会学校，1854 年由教会送往美国留学。1862 年返国，任上海英领事翻译，后改就工部局通事，以后担任圣约翰书院学监，虹口救主堂牧师。吴虹玉（1834-1919），江苏常州人，1848 年入上海教会学校，受洗入教，1854 年秋随军舰去美国，在一家报馆当印刷工，1864 年回到上海，在教会工作。

8 个人当中，至少 5 个是广东人^③，3 个是香山人，其中，唐廷植曾在旧金山为维护华人权益而进行斗争，在给工部局的信中，他的名字签在最前面。其签名的名称顺序如下^④：唐茂枝^⑤、谭同兴、陈咏南、李秋坪、吴虹玉、唐景星、颜永京、陈辉庭。因此，有理由认为香山人在这次抗争事件中起领头和骨干作用。

其二，抗争有理有节。唐廷植等人既反对租界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华人，但也批评一些华人不守游览规则、折损花木的不文明举动。在交涉中，他们所持的理由，完全是西方社会公认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击中要害，所以，工部局无言以对。这种世界眼光与斗争艺术，与他们开阔的视野、所受良好的西方教育密切相关。

顺便指出，上海租界各公园最后向华人开放，也与寓沪广东人努力有直接关系。包括外滩公园在内的上海租界公园，是在 1928 年 6 月以后，陆续取消禁令，向华人开放的。其时代背景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民族主义高涨，汉口英租界被收回，上海租界当局不得不作些让步。其直接原因，则是上海绅商的持续交涉。为了交涉租界公园开放，上海总商会推选冯炳南与吴蕴斋、刘鸿生为代表，组成开放公园华人委员会会员，领头人是大律师冯炳南。冯炳南从 1926 年 3 月 20 日开始与工部局交涉，书信往复，持续两年多，从法律角度，逐一驳斥工部局的诡辩。工部局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同意开放。冯炳南虽然不是香山人，是广东高要（今肇庆）人，但属于广肇公所，与上海香山人士声气互应。

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广东人在上海反帝爱国斗争中常常走在前面，这一现象很值得研究。

从上海香山人看香山文化

寓沪香山人最多时也不过 3 万多人，但他们在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上海，却那么彪炳显赫，引人注目，干了那么多大事，出了那么多名人。考其原因，就是香山人一直在讨论的香山文化在起作用。

从上海香山人的身上，我以为可以归纳出香山文化的四个特点：

- ①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3、411、760 页。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台北知书房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9 页。
- ② 吴鸿钰（即吴虹玉）：《善士李秋坪太守传》，《申报》1888 年 3 月 31 日。《吴虹玉牧师自传》，朱友渔整理，徐以骅译，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 7 辑，1997 年版，第 303 页。
- ③ 陈咏南很可能也是广东人，待考。
- ④ 参见《唐茂枝等八人致工部局秘书函》，见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 1885 年年报。
- ⑤ 唐廷植字茂枝。

其一，目光远大，视通中西。近代香山，处于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香山人接触西方早，走出国门早。容闳、黄胜、唐廷植、唐廷枢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时，内地一般人还不知道大地是圆球，不知道英吉利、美利坚，更不知道近代西方声光化电。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时，香山子弟那么多，京师及各地官绅还耻于与洋人接触。1883 年，唐廷枢偕袁祖志等游历欧洲各国，回国后，为袁祖志所作游记写序，内称处今之世，了解外国，应该“身历其境，心识其事，略其小，详其大，揣其本，明其末，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①。这几句话，可以看作香山人走向世界、心系中华的写照。唐廷植、唐廷枢兄弟以一商人而编辑《英语集全》，郑观应以一商人而写《盛世危言》，其议题广度、思想深度，令当时众多专门读书治学的文人汗颜，这些本来应该由专业文人做的事情，倒让商人去做了，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时空来考察，就不难理解了。既知道西方、又了解中国的香山商人，与既不了解西方、又盲目自大的内地文人，适成鲜明的对比，而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启蒙，需要振聋发聩的呐喊，于是，这付担子落到了香山商人身上。

其二，善捕良机，决策果断。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并不鼓励向外移民，也没有保护华侨的政策，甚至苛待华侨。但是，香山人善于捕捉时机，看到了向外发展的巨大空间与美好前景，移民东南亚，移民北美，以后又移民澳洲。虽然千辛万苦，但是成功了。五口通商以后，香山人又一次捕捉到良机，北上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到上海、天津、汉口发展，他们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容闳曾经拒绝当买办，认为那名声不好，他坚守的是中国文人珍视清誉、爱惜羽毛的传统。但这是个案，一般香山人不是这样，而是看准就干，迅速付诸实施。香山买办有许多成家族现象，子承父业，弟继兄业，世代相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畏清议。光绪初年，石印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原来从事房地产、航运业的徐润抓住了这一机遇，果断地投资石印业，开设同文书局，获得极大成功。清末民初，环球百货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身在澳洲的香山华侨，抓住了这一机遇，转身向内，大举发展，创办了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他们再一次获得了成功。即使是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华侨资本由内地向香港、澳洲等地转移，也是他们从全球的角度审时度势作出的果断决策。日后成为上海新新公司经理的李承基，少年时代在上海悠闲地学习上海话，在私塾里读诗书，学习《唐诗三百首》、《东莱博议》等传统文化，突然，他的父亲李敏周（新新公司总经理）遇刺身亡，他的母亲立即决定，要他改变方向，专攻英文，并请了专门的英文教师^②。李承基母亲看到了，在李敏周去世以后，对李承基来说，日后最好的发展空间，就是子承父业，最好的途径，就是懂得现代企业惯例，最近期的努力，就是先学好英语。机会永远向有准备的人招手，机会也永远向果断的人伸手。虽然看准，但不果断，仍然会让机会从身边溜过。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其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据研究，唐廷枢一生自营、合营、参与、主持的各种企业有 47 家，涉及航运、矿业、铁路、医院、学校等方方面面，每一样他由外入内，仔细琢磨，认真学习，力求最好。这简直叫人难以置信。郭氏兄弟为开办永安公司而进行游客调查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

日升楼转角马路边上，面对面站着两个壮汉。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两个人的双手全都又在短褂子衣袋里。一会儿，右手摸出样什么东西，递交左手，左手连忙接住放进袋袋；一会儿，摸来递去，再放再掏的动作又重复一遍、两遍、三遍……

郭葵许以重金交代他俩，每从身边走过一个行人，就摸出一粒豆子放到另一边的袋里去，一个也不能放过，一个也不能弄错，从早到晚，就做这件工作，但不得有丝毫差

^① 唐廷枢：《出洋须知》序，袁祖志《出洋须知》，光绪丁酉上海藏经史馆石印。

^② 陈绛校阅、黎志刚访问整理：《李承基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年版，第 44 页。

错。^①

说的有些传奇，但反映了郭家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人都是学而知之，在学习中不断成熟、不断成长的。只要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就能与时俱进，不断进步。郑观应的著作，从早先的《易言》，发展到《盛世危言》的初版、修订版、再修订版，就是不断汲取新的养分、逐步完善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不断修正、精益求精的生动纪录。

其四，融会中西，植根中华。上海香山人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出名，孙中山自不用说，其余香山名人，从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到郑君里、萧友梅、王云五，无不如此。但是，在吸收西学的同时，他们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在骨子里仍然是中国文化，是吸收了西方文化营养的中国文化，是随时而进的中国文化。唐廷植、唐廷枢急公好义，在慈善方面作了许多贡献，唐廷枢单是义校就支持了9所，专供贫困子弟入学^②。徐润在社会公益方面，举凡赈灾、医院、学校、孤儿院、尚贤堂、青年会、洋药局、派遣留学生等方面，无不尽力为之。杨梅南在担任太古洋行买办、广肇公所董事时，凡流落在上海的广肇同乡，都可免费搭载太古轮船返回家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上海香山人在这方面表现相当突出。读李承基的口述史，看先施公司及其他香山人的行事，重然诺，讲信用，忠爱仁厚，济贫帮困，乐善好施，完全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儒商。先施的英文名称 SINCERELY，揭橥的旗帜就是“真诚”。先施倡导的“货不二价”，搜集世界各国商品，分门别类，加以陈列，供顾客货比三家、自行选择，打破了商场讨价还价的惯例，树立了诚恳直率的商业形象。

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这四条，前三条是行为特点，第四条是文化特色，综合起来，就是从上海香山人身上反映出来的香山文化。

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发掘地域文化资源，纷纷提出以地域命名的某某文化，恰如其分者有之，牵强附会者亦有之。从近代上海香山人行为特点来看，我觉得，香山文化不但实至名归，自具特色，而且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思童)

Xiangshanese in Shanghai and Xiangshan Culture

Xiong Yuezhi

Abstract: Among the modern immigrants in Shanghai, Xiangshanese amounted to 30,000 people at most. The absolute figure was not big and the proportion was not high, but the influence was large.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many Xiangshan people were successful and famous. There were four aspects that had the most large influence. First, comprador groups started early and had great influence. Second, global department store had four companies that established the fashion and upgraded Shanghai's status as business center and its service image. The third was the Xiaodaohui Uprising. The fourth is the negotiation in the Bund Garden. Scholars has discussed a lot about the first two, and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last two. Xiangshanese in Shanghai had four features: they had great goals and was not trapped only in China; they were good at capturing good chances and making decisions immediately; they worked hard;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had their roots in China. They were the reflection of Xiangshan Culture.

Key Words: Xiangshanese; Xiangshan Culture

^① 庄新儒：《海上百货大亨郭琳爽》，赵云声主编《中国大资本家传》第8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② 唐佑钧、唐仕进：《唐廷枢传记》，《珠海文史》第7辑。